



国际安全问题
参考丛书

美日联盟：

过去、现在与将来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美) 迈克尔·格林 帕特里克·克罗宁主编

华宏勋 孙苗伊 丁胜幸 等译



新华出版社

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

[美] 迈克尔·格林 主编
帕特里克·克罗宁
华宏勋 孙苗伊 丁胜幸 等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 / (美) 格林 (Green, M.J.) 等
主编；华宏勋等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

(国际安全问题参考丛书)

内部发行

ISBN 7-5011-4774-4

I. 美… II. ①格…②华… III. 日美关系 - 研究 IV.
D8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7913 号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pyright © 1999 b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

[美] 迈克尔·格林 主编
帕特里克·克罗宁
华宏勋 孙苗伊 丁胜幸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340,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774-4/D·761 定价：26.00 元 (内部发行)

(提请读者注意：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前 言

在我担任国防部长的任期内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是在 1996 年 4 月完成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当时，报界大量报导了克林顿总统在日本与桥本首相进行的首脑会谈。会谈中提议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作为两国对在冲绳和台湾海峡所发生事件的反应。对这两个事件，我与我们的日本同事早在 1995 年秋就联盟的未来开始了广泛的双边会谈。虽然当时这些对话主要是在政府与政府之间进行的，但其中美国方面的与会者主要是来自智囊团和学术界的专家。很多学者在会议中讨论了美国政府如何进一步处理与日本的安全关系。这些关于扩大和加强现有的美日联盟的讨论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本书集中了优秀学者对美日安全关系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对将来发展的可能性所提出的杰出见解。

在这里，我向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各方面学者推荐本书。参加编写这本书的学者和分析家对美国的亚洲安全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对下一世纪这一联盟的

支持正继续发挥很大的作用。亚洲的读者也可以从中了解美国对于安全政策和来自美国知识界的信息。美国的读者将了解我们与日本的这个联盟的演变情况、挑战以及它们在未来面对的问题。

战后美—日安全关系的早期建筑师之一吉田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刻就曾经警告说，在将来如果没有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日本就不能富强。在这本书中，他对日本利益的先见之明得到了证实，而这一论断对美国也证明是正确的。美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而且美国的富强将有赖于它与日本之间的亲密合作和安全关系。

**美国国防部长
威廉·J·佩里**

说 明

过去数年内，美国和日本各界人士就美—日联盟的“重新定义”、“修订”以及甚至对它的“重建”问题开展了争论，但是他们却常常忘记讨论如何使这个重要的安全关系充分发挥作用。在这本书内，由 17 位美日联盟问题专家填补了这个空白，说明了联盟的历史演变；军事、外交以及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技术联系；国际及国内对安全关系的压力；以及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本书的主编，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迈克尔·格林和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帕特里克·克罗宁要求作者们说明联盟的作用是如何在亚太地区内提高美国利益和加强稳定的。

撇开美国政策中与中国的所谓“战略伙伴关系”，与俄罗斯的“联盟”这些花言巧语，美国在现实情况下能够在亚洲实现它的目的，就不能没有它的传统盟国——日本的紧密战略合作。本书除了说明为什么是这么回事之外，还指出需要做些什么以确保美—日联盟能够迎接将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来自朝

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地区经济上的不稳定性，或来自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造成的威胁。有的威胁是联盟能够对付的；而有的它就对付不了。美国在不损害东亚稳定的情况下准备怎样处理突发事件？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好好地读这本书。

劳伦斯·J·考尔布

序 言

从1994年10月至1996年4月，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就冷战结束以来的安全关系进行了广泛的双边审议。由于这项工作是由当时负责国防安全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小约瑟夫·奈提议的，因此在新闻媒介中，将这项总结称作“奈氏倡议”。1995年9月在冲绳发生美国士兵强奸女学生和1996年3月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导弹试验的突发事件使审议工作中断。这两个事件使公众对美日联盟在日本的实施出现了争议，这也迫使两国政府加快会商的进程。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4月会晤，他们汇总了“奈氏倡议”的结果后，形成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通过这项文件，两国领导人试图说明由于前些年内出现的政策和安全危机而产生的美日联盟，在当前的政治上和行动上具有更大的可信赖性。总统和首相在安全宣言中特别强调了：

●承认联盟在继续保持地区安全和稳定上的重要性；

●再次确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在这一地区保持驻军10万人的重要意义；

●为了在处理地区突发事件上开展合作，要求对现有的防务合作方针进行审议（现有的方针只限于日本自身的直接防御）；

●批准了一项新的采购和多兵种协议（Cross - Servicing Agreement）；

●批准一些关键的美国军事设施返回冲绳和日本，确保美国

的兵力；

●双方共同努力，帮助中国在地区稳定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实施“奈氏倡议”和宣布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全过程中，观察家们提出了各种疑问：这是要对美-日联盟作出新的定义，还是仅仅对它再次作出肯定？一方面，对现状持批评态度的人要求日本在地区防御中做得更多一些（或要求美国驻军在日本的领土上少做一些），并且认为重新定义是不够的。而在另一方面，批评的意见是恐怕日本做得太多，并且警告说安全宣言在实际上是改写了条约，因此认为所谓的重新定义也走得太远了（这主要是中国人的反应）。为此，桥本首相和克林顿总统回避“重新定义”这种说法，并且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宣称他们只不过是再次肯定双边联盟的重要作用。

是对联盟重新定义，还是只对它再次肯定？1994年7月，当安全宣言还停留在概念阶段的时候，我们出版了一本名为《为美日联盟重新定义》的专著，为双边对话提出议题。这个题目是来自日本，而不是由我们提出的。事实上，回想起来，引入重新定义的概念是在字面上论证联盟的作用。我们出这本专著的意图是提出一个供讨论的议题，以求加强美-日安全合作，而不是重新解释或改写安全条约。但是，听到某些反应之后，我们认为，开展对重新定义和再次肯定的争论是有必要的。我们还认为，如果要考虑对联盟需要作哪些改变，这就要求对它作出评估，而这就超出这本专著篇幅的讨论范围了。

为开始这项工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保尔·H·尼兹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防大学的国立战略研究院和防务分析研究所联合发起，并在1995年12月举办了一次名为《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学术会议。主办者邀请了美国和日本的学者和政策分析家提出一系列关于联盟关系的历史、政治等关键问题的论著。会议结束时，与会的学者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他们

的研究成果。大多数与会者同意合作，将会议中的优秀论文经过修订和增加内容后出版。本书就是以上工作的成果。

在汇编各位作者的论述和准备我们自己的结论和推荐意见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编辑的，很可能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介绍联盟全面情况的“所有者手册”。按照这种考虑，我们将这本书编排成4个部分：战略环境、军事同盟、联盟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安全。在埃米利·梅兹格尔、罗丽·拉尔和田中吉子的帮助下，我们还编了一份大事记和注释性的附录，帮助本书的读者，作为进一步研究和调查的入门。

本书这些章节的作者是政策的制定者、历史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家。他们在政治和学术方面，都积极地参与了1996年4月《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制定和以后的实施工作。他们一致同意维持和加强美—日联盟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如何做上存在着不同的想法。他们对美—日安全合作的政治、历史和发展过程都有十分透彻的理解。他们无意代表政府和他人，而只是发表他们个人的见解。这本书着重于介绍美国与会者在研究和政策上的讨论。这些作者希望在下一本书中能够有来自太平洋两岸的不同观点讨论。

安全的折衷派和参与这本书的日本专家共同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一是所有的作者，不论对现状是否持批评态度，他们都认为美日联盟的基本前提是：保护美国的利益和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而实际上，在这里所有的争论其根据是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非出自理想主义。美国和日本确实是依靠民主、公开的经济体系和人权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正如这本书中所集中讨论的，在激烈竞争和充满不测事件的世界中，真正使两者组成联盟的“黏合剂”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合作。对政治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毫不含糊地阐明促成双边合作的动力，而且共同安全的利益最终要取决于联盟的持久性。

本书中的第二个题目是这个联盟仍然还不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军事联盟。从技术合作到军事计划，美—日联盟在很多方面都不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或美—韩联盟（ROK）那样牢固。造成这方面差别的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的遗留问题和日本的国内政治状况。在美国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旧观念”。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联盟，美—日安全关系是冷战期间的一项巨大成功。它帮助阻止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并且对地区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正如希拉·斯密斯在她的那一章中所述，在那个时期内美国和日本逐渐地建立了军事合作的基础，但是它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冲击，是日本安全政策和在这地区重新武装的合法化。希拉·斯密斯与其他作者指出，联盟的可信赖度现在要取决于在美国与日本部队之间，能够把政治合法化转变成实际的军事协同作战和战备的能力。1996年4月的首脑会谈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仍然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

渐进主义是第三个题目，这是全书所有作者都在讨论的问题。不论是军事合作的提升、建立日本国内对双边安全合作的共识，还是技术合作的管理，日本都在向前努力。但是，前进的步子很小，并且在地区的反应和国内的支持上都存在着很多疑虑。因此，不同的作者对渐进主义做法的效果是否好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在另一方面，可预测性在地区稳定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此外，日本在处理地区危机中的作用“太小，太慢”也对双边安全关系起着破坏的作用。本书内数篇关于历史的论文指出，日本安全政策的改变常常是出自国内政治对危机、力量的地区平衡，或美国安全政策的反应。对于华盛顿的挑战而言，是要使双边合作保持向前发展而不是依靠出现危机来推动它。在某种程度上，1995—1996年的“奈氏倡议”被证明是一种能够自发地加强安全合作的能力。即便是在冲绳和台湾海峡出现突发事件时，它仍能推动合作向前发展。

第四个题目，特别是在罗伯特·曼宁和詹姆斯·普尔兹斯塔普的那些部分，讨论的是在亚洲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中美日安全联盟的日益重要作用。美日安全合作常常具有地区性的特点，在冷战期间日本与美国结盟为了增强自卫和围堵苏联的政治势力和军事扩张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东亚在冷战后安全环境的变动很快，因此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中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整个地区，特别对北京的安全考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新的变动要求放弃更多的双边安全合作。华盛顿和东京处于长期的压力之下，要求美国驻军在不违背承诺和不威胁中国和韩国的条件下，增强地区安全合作。在不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看来采取渐进主义是难以避免的。

第五个题目是美国和日本的政策制定过程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固定和政出多门。好的方面是两国对联盟的支持正在扩大，因而传统上对联盟的反对派（贸易上的鹰派，左翼社会党人和修正主义者）现在越来越孤立了。与此同时，在日本参加安全辩论的人数在增加，而自由民主党和政府中的防务政策精英的影响已经削弱。正如李·豪威尔所指出的那样，政治上的继续再结盟将只会使联盟关系的管理上的政治不确定性增大。与此同时，在美国反对海外驻军和推进的声音早已销声匿迹。但是，理查德·塞缪尔斯和克里斯托弗·特梅在他们的那一章中指出，联盟内新变化的理论基础是未来对现状下经济和安全的挑战。在美、日两国，对美日联盟的“反对”与“支持”的情形可以用日本话“总体赞成，具体反对”予以说明。

编辑们在本书的结论中对这些题目进行了复查。本书的内容被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战略环境，它为后面的案例研究建立一个理论和政策的框架。第一章，《老鹰注视着太平洋：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外交政策选择》中，理查德·塞缪尔斯和克里斯托弗·特梅指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选择是：（1）保持现状，（2）

中止联盟，放弃国外军事基地，同时发展远程军事能力，(3) 寻找新的盟国，和(4) 重整美日联盟。理查德·塞缪尔斯和克里斯托弗·特梅清晰地列出政策选择，并且这一章为下文做了很好的开头（尽管我们不赞同他重整联盟的办法）。这一章特别重要，是因为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在使得联盟适应地区安全环境和求得国内在政治上支持联盟这两者之间取得折衷。“对等”和“公正”对于前者而言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完全有害的话），但是对后者是不可或缺的。

在第2和第3章内，詹姆斯·普尔兹斯塔普和罗伯特·曼宁调查了对双边合作的限制地区安全和双边合作的能力反过来如何影响地区环境。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那一节内，詹姆斯·普尔兹斯塔普在历史展望中，指出这是东亚最关键的三边关系。他的结论是：历史教导我们，美国和日本都不能强迫中国做违背它自身利益的事。但是，美日联盟能够通过行动，创造出一种国际环境，使得北京认识到融合到世界中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曼宁在《东北亚未来的冲突和美日联盟》一文内调查了美—日联盟在改变地区未来安全环境中的作用，并且得出结论，如朝鲜半岛的改变这样的事件只会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并且对地区的安全政治起阻碍作用。他指出，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发展令人担心，因为它是反对加强美—日联盟作用的，它们的行动很谨慎，但是这其中包含着风险。他认为超级大国现在应该行动起来建立起新的平衡，而不是把它们希望寄托在像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地区论坛这样的多边组织上。他在文内建议，美—日联盟能够通过解决问题和自我制约来加强这个平衡。

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即军事联系，讨论美国与日本之间防务合作的细节。在《美—日联盟中军事合作的演变》一文中，希拉·斯密斯指出联盟关系成立一段时间之后，方才开始美日军事合作。当时没有一体化的指挥或联合战略，华盛顿和东京必须通过

像制定 1978 年的非固定的防御指导方针和在 80 年代划分地区分工的办法建立起军事合作。希拉·斯密斯认为，这种一般性的做法在当前的确定军事合作上仍然是合适的。但是她指出，如果美国和日本要开始考虑在日本防御以外的地区如朝鲜半岛上的突发事件的军事合作，它们将遇到很多问题。她还说明，1997 年对防御指导方针作修订之后，使美国和日本进入了情况不详的水域。因此新指导方针的成功要取决于东京如何调整日本自卫队的职责，同时又不违背宪法的本领。在《管理新的美 - 日安全联盟：提高结构和机制以适应后冷战时期的需要》一文中，保罗·贾拉和长岛明石解释了在美国和日本之间如何用独特的行政与政治布局替代联合的指挥机构。他们介绍修订的 1997 年防御指导方针中新的军事合作结构和联合使用基地将加重对传统体系的压力，因而指出，如果不成立实际能够发挥作用的联合指挥部门的话，现在应该是考虑建立联合参谋部的时候了。直接的军事对军事的计划成为总体美 - 日安全关系中最新的方面，美国军队在日本驻扎已经成为联盟的核心问题。在《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历史背景和保持战略现状的新举措》一文中，保罗·贾拉解释了美国在日本军事存在的历史与目的。他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军事基地，联盟以及亚洲的稳定就不可能存在。与此同时，他承认存在着日本国内对美国基地的政治压力增大的可能性，并且提出考虑由扩大联合的双方共同使用基地和其他步骤求得提高效能和取得公众支持的可能性。安娜·狄克逊在《鹰和鹤能一起飞吗？冷战后，美国和日本转向多边安全》一文中为美 - 日安全合作提出最新的议题。她指出了美国和日本在保卫和平的运作与多边对话上的不同之处，还说明了多边主义的固有局限性。她得出的结论是，仍然有足够的重叠部分为双边合作提供重要的出路。她认为在多国或联合国的旗帜下，两国或许能够在中止冲突（美国的作用）和人道主义的或经济的重建（日本的作用）之间找到有效的分工。

第二部分的结尾，帕特里克·克罗宁、保罗·贾拉和迈克尔·格林讨论了美日在战区导弹防御上的合作。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联盟关系中最令人烦恼和最复杂的方面，即国内的政治过程。托马斯·伯杰在他的《联盟政治和日本战后的反军国主义》一文中对这个问题的历史作了说明。托马斯·伯杰认为，安全关系通过对重新武装设置限制，使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原先不安定的结合转为稳定。与此同时，联盟使日本对冷战后世界的政治态度向两极化的方向发展。这样使得处于中间派围绕联盟达成共识的人成为最大多数，而使极左和极右派成为少数，一种战后反战主义的新文化已经植根于准则和双边安全合作之中。李·豪威尔在《美日联盟和日本在冷战后政治改组》一文中挑选了一个 90 年代的故事。他叙述了新的选举规则、新的党派以及壮大中的地方政治影响将增加对日本集体自卫权利和美国在冲绳的基地等问题的争议，但是公众对联盟的支持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

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全书的最后部分剖析美 - 日联盟的经济、技术、安全方面，这也是学者在最近 10 年内活动最活跃的领域。在《经济与安全：概念框架》一文中，迈克·望月概述了这个分析背后的理论传统。他指出了主张经济关系增加美国与日本之间相互依赖的自由主义贸易与现实主义贸易之间的差别，后者主张追求相对的获利将使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摩擦增大。他认为目前形式主义者对东亚国际关系中经济增长的展望是太大惊小怪了。但是他确实从地区经济一体化增大中看到对安全的某些负面影响。根据美日联盟，这些负面影响是（1）对日本“系列”商业集团的国际扩张的疑虑与日俱增，和（2）美国在突破日本在第三亚洲市场上接连遭到挫败。在他的政策建议中，迈克·望月反对把美国的贸易直接与对日本的安全政策联系在一起（疑惑美国政府能够做甚至在它要求的时候），但是认为必须保持压力，

使美国能够进入日本的市场和技术，这样就使私人企业在美国的挫败不至于对联盟造成损害。

劳拉·斯通的那一章建筑在望月的理论框架上，她提出在美-日联盟的经济与安全之间采取具体的历史和政策的折衷处理方法。在《贸易与安全何去何从？历史的展望》一文内，劳拉·斯通解释了到冷战末期，贸易摩擦如何演变成为安全关系的副产品。但是，她得出的结论是，日本迟缓的经济表现，冷战后10年来与中国之间出现新的贸易摩擦可能再一次帮助把联盟与经济问题隔开。

迈克·望月和劳拉·斯通就双边贸易和投资对安全关系的影响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一个领域里，贸易、技术和安全显然是交叉的。这个领域就是军工生产。在《美-日军备合作》一文中，格雷戈·鲁宾斯坦为武器的销售和研制对双边安全纽带的重要冲击提供了历史上的证据。他认为，日本自己制造武器是越来越困难了，如果美国在技术转移和联合研制上采用更灵活的做法，其结果只会导致日本与美国更多的一体化。迈克尔·钦伍尔斯在他的《美-日安全关系中的技术因素》一文中特别指出：日本的两用技术能力正在加强双边的防务合作。钦伍尔斯根据美国政府对日本能够采取的手段，和日本政府提供民用技术的能力，列出了一系列政策选择，并且指出这两方面都存在限制。他的结论是：为了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达到技术与安全利益的平衡，最有效的办法是采取低姿态（lower-profile）的态度参与（hands-on）双边的科研工作。

这总共四部分、十四章的论述为本书的主编作出结论和建议（位于本书的结尾处）提供了分析的依据。我们相信在当前联盟结构内历史的、地区的、以及国内政治的混合影响会导致有信心的未来双边安全关系和清晰的政策选择。尽管我们是以各章作者的论述为基础，但是有可能他们并不同意我们作出的建议。读者

也可以作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这一项工作在得到 5 位重要人士的帮助下完成了。他们是 SAIS 的安德鲁·巴塞维奇（现在波士顿大学），他帮助了这项工作的启动，国立国防大学（NDU）的爱米丽·梅兹格尔和罗丽·拉尔帮助完成手稿的最后整理和出版。此外，还要感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长岛明石和田中吉子完成了本书的附录。

注释：

1. 参阅丹尼尔·威廉姆斯的《重建与东京的军事纽带》，《华盛顿邮报》1995 年 2 月 22 日；或 Sankei 新闻 1995 年 2 月 22 日。